

中国出版

● 主编 宋原放 ● 副主编 吴道弘 张立升 王建辉

史料

现代部分

ZHONGGUO CHUBAN SHILIAO

补卷 下册

● 方厚枢 辑注

山东教育出版社
湖北教育出版社

中国出版史料

主 编 宋原放

副主编 吴道弘 张立升 王建辉

现代部分

● 补卷 下册 ●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〇〇〇年十二月)

● 方厚枢 辑注

山东教育出版社
湖北教育出版社

目 录

下 册

- 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开端 方厚枢 (777)
- 新中国对私营出版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概况 方厚枢 (804)
- “大跃进”年代的出版工作 方厚枢 (826)
- “三家村”与北京出版社 周应鹏 (850)
- “文革”后期出版工作纪事 方厚枢 (863)
- 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杨牧之 (897)
- 中国高层领导与《星火燎原》 黄 涛 (917)
- 四十二年磨一剑——记《李自成》的写作和出版
..... 王维玲 (931)
- “童怀周”编辑出版《天安门革命诗抄》纪实 ... 汪文凤 (963)
- 北京古旧书业的变迁——记中国书店建店五十年
..... 周 岩 (981)
- 八年成旷典——《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出版纪实
..... 宋木文 (991)
- 香港图书出版业的过去和现在 沈本瑛 (1022)
- 澳门印刷出版史述略 林子雄 (1041)

台湾出版史概论	辛广伟 (1055)
---------------	------------

附 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纪事（2000—2005 年）	(1065)
2000—2004 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	(1080)
中国出版史研究书刊题录	(1086)
《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目录	(1118)

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开端^①

方厚枢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各个解放区都已建立了新华书店。它们在各地中共党委的领导下，担负着各个解放区的书籍出版、印刷和发行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部分城市中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以及三店用化名开办的机构，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编辑、出版、发行进步书刊。

1948年，解放战争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了迎接全国解放的新局面，管理好新解放区特别是大城市的出版事业，中共中央对新解放区出版事业的政策，以及对全国解放后出版事业的集中统一等问题，多次作出指示，并采取了一系列的重要措施。中共中央宣传部1949年2月在解放了的北平成立的出版委员会，做了许多切实的工作，使新中国出版事业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为建国后我国出版事业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中共中央对出版事业的指示 和采取的重要措施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各民主党派、各民主团体和爱国民主人士团结起来，打倒反

动派，召开新政协，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共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这个号召，给全国人民极大的鼓舞。

这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工作的周恩来，在以很大精力协助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发动进攻的同时，对全国解放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政策问题作了设想和思考。他对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建设也十分关注。

1. 周恩来指示将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人员主力逐渐转入解放区

1948年6月6日，周恩来从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发电给中共香港工委章汉夫，再经胡绳转达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负责人徐伯昕、黄洛峰、沈静芷，要求他们：“即将三联工作人员及编辑人员主力逐渐转来解放区，资本亦尽可能转来”，并对三家书店近期的任务和注意事项做了重要指示。^②

生活、读书、新知三店领导人为了迎接全国胜利后的新局面，在中共香港文委领导下已做出三店全面、彻底地合并的决定，接到周恩来的电报指示后，加速了三店的彻底合并工作。于10月18日召开三店的股东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三联书店临时管理委员会，推选黄洛峰为管委会主席，徐伯昕为总管理处总经理，沈静芷为副总经理，万国钧、薛迪畅为协理。26日，召开三店全体人员大会，宣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成立。这次成立大会，同时也是三联同人开赴解放区的誓师大会。会后，大批同人分批奔赴解放区。^③

2. 中共中央发布对新解放区新闻出版事业的政策指示和处理办法

1948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新解放城市中外报

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指示》，指出：对于私营报纸、刊物与通讯社，一般地不能采取对私营工商业同样的政策。《指示》明确规定了接管、清理旧中国新闻事业的政策方针，即：保护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剥夺反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

同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对新区出版事业的政策暂行规定》，作出下列几项规定：（1）没收国民党反动派的出版机关。如正中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独立出版社、拔提书店、青年书店、兵学书店等，均属此类。如有民营书店之借用上列牌号者，则应在处理上加以区别。此类书店没收后，原书店即不准再开业。（2）民营及非全部官僚资本所经营的书店，不接收，仍准继续营业。其中官僚资本应予没收者，须经详细调查确实报告中央，再作处理。（3）凡允许继续营业的书店，其书籍暂任其自由发卖，不加审查。如出版教科书者，则劝告他们自行停售党义公民等教科书，及自己修改有关政治的教科书（如历史）。（4）对于新出版的书籍中，如有政治上反动而又发生了重大影响的书籍，必须干涉及禁止者，暂时采用个别禁止及个别干涉的办法。这些书籍和非由显著的反动派所著作出版，则在采取禁止干涉措施前，应向中央请示。

3. 中共中央决定建立全国统一集中的出版领导机构和采取的重要措施

鉴于全国胜利的即将到来，如何将长期处于分散状态的各解放区工作统一起来，已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在出版方面，中共中央于1948年8月间鉴于当时的形势和对以后局面开展的估计，决定建立全国性统一集中的出版领导机构。在中央的部署下，开始采取出版事业由分散到集中统一的各项措施。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管理处成立之后，黄洛峰奉调北上，于1949年1月到达东北解放区的沈阳。中共中央1月28

日发给东北局的电报中说：“黄洛峰是调来准备担任中央出版局工作的，望帮助他了解东北及三联两书店的出版情形、干部配备、印刷力量和纸张供求情况，然后要他迅速前来，以便建立中央出版局。……中央出版局成立后，须解决全国党的书店如何统一，及与三联书店如何在统一领导之下分工合作等问题。你们的意见，请交他带来。”^④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中央于2月11日对北平解放后出版事业的统一与建立领导机构等问题，发电给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北平市委第一副书记、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叶剑英，北平市委第二副书记赵振声（即李葆华）并告中央宣传部派来北平工作的出版组祝志澄、华应申。电文中提出：“组织临时的出版工作委员会，由黄洛峰、祝志澄、王子野、平杰三、华应申、史育才、欧建新为委员。委员会主任由周扬到平后决定。”^⑤

黄洛峰于2月中旬抵达北平，周扬于2月16日在华北局宣传部召开临时出版委员会筹备会第一次谈话会，传达中央宣传部陆定一部长指示：“暂先在华北局宣传部领导下，由中宣部出版组、新华书店、新中国书局^⑥等处同志合组临时出版委员会统筹华北出版工作”，并指定黄洛峰为主持人。

2月22日，出版委员会正式成立。在第一次会议上，周扬进一步明确说：平、津解放后，出版上的第一件事首先应该是做到统一，在步骤上首先把平、津先统一起来。从出版计划来说，首先应该统一的是出版，如教科书、马恩列斯的著作、毛主席的著作都要赶快做到统一出版，只有先求得出版的统一，业务才能统一。目前的工作重点在北平，首先解决平、津的统一，将来再召集各区，商讨整个合并。

出版委员会成立后，黄洛峰和委员们经过反复讨论，拟定了

《出版工作计划书》，内容包括出版工作的领导方针、出版工作的分工及其任务、中央出版局的建立步骤，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并拟出《中央出版局组织大纲（草案）》。3月初，黄洛峰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向中央汇报、请示。

3月17日，陆定一将与黄洛峰商谈的情况和对出版局工作方针、资金等问题的意见向周恩来作了书面请示。周恩来批交董必武、胡乔木先阅。董必武对资金、财务和纸张问题提出五条具体意见，连同黄洛峰带来的《出版工作计划书》和《中央出版局组织大纲（草案）》，经周恩来作了最后阅批，指示：“出版工作需要统一集中。但是要在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在有利和可能的条件下，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走向统一集中。”出版委员会秉承这一指示，逐步实现出版工作的统一集中。

早在1948年8月，胡愈之奉命赴解放区，由香港经朝鲜转大连等地，到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向中央汇报在海外工作情况。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接见了他并谈了话，决定他还是在中央统战部领导下做民主党派的工作。胡愈之于1949年2月1日到达解放了的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5月着手筹办民主同盟中央机关报《光明日报》工作并担任总编辑。他于3月间见到周扬时谈了对新中国出版事业的设想和意见，周扬于3月17日将胡愈之对出版工作的五点意见，向中央发电作了汇报，在电文中提出建议：“可否请其参加或主持出版方面工作，他对此有经验，亦有兴趣，如何盼示复。”^①9月，胡愈之被聘任为新华书店总编辑，10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出版总署署长。

二、接管·建店·供应新书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大中城市的陆续解放，在出版方面面临的紧迫任务是：城市解放后，在当地军管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出版接管工作，同时筹建新华书店，让门市部尽快开业，向新区广大人民供应新书。

1948年11月，华北新华书店根据华北局宣传部通知，派出以副经理李长彬、王钊为首的书店人员到平津前线准备入城后参加接管工作并建立新华书店。1949年1月初，中央宣传部电告东北局宣传部，要求东北书店派部分干部随军入关，协助中宣部出版组和华北新华书店参加平津两地接管和建立新华书店工作。东北书店总店（当年7月1日改称东北新华书店）抽调三十余名干部，由副总经理卢鸣谷、齐齐哈尔分店经理史修德率领，携带书籍七百余种、三十余万册，赶赴平津前线。山东和华北、西北、华中新华书店也赶印了大批图书派遣干部随军进入新解放的城市。由于各方面的努力，天津、北平、南京、武汉、上海、广州、西安等城市解放后，出版接管、建立新华书店和向新解放区人民迅速供应新书三项任务都完成得很有成效。下面仅举北平、南京、上海三地的情况，以见一斑。

1. 北 平

1949年初平津战役期间，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并肩战斗。出版方面，东北书店和华北新华书店派出的一批干部也团结一致，共同参加平津两地的出版接管和建店工作。中央宣传部派出以祝志澄、华应申为首的出版组，于北平和平解放后一面参加接管，一面部署出版工作。

在解放军围困北平的前夕，朝华书店（三联书店 1946 ~ 1949 年在北平设立的机构）经理陈国钧（1948 年初至 1949 年）与北京大学文化服务社负责人朱彤（均为中共党员）为了宣传党的政策，使知识分子和工商业主不受国民党的谣言蛊惑，根据解放区出版的报刊和中国共产党的文件编印了《论知识分子政策》、《城市工商业政策》两本小册子，秘密散发到知识分子家中、学校、商店等处；并注意摸清市中心的国民党官僚、特务等机构位置，供有关部门接管时用；又将秘密藏放在五个地方的革命书刊运回书店，于解放后供应读者。^⑧

1 月 31 日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于 2 月 7 日命令徐迈进、万启盈、卢鸣谷和王钊、张兴树组成两个军管代表组，分别接管了正中书局北平分局、独立出版社、中国文化服务社北平分社及其所属印刷厂。2 月 22 日，祝志澄、周永生等组成的军管组接管位于北礼士路的正中书局北平印刷厂。黄洛峰在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曾说：“我们进入北平以后，在工厂中控制的物资很少，拿到一个厂子，差不多都是一些破破烂烂的东西，拿到的纸头不到 2 000 令。”据有关史料描述接管正中书局北平印刷厂的情况时说：“接管时，厂内四门大开，轻便物资几乎全被劫走，遍地布满避弹壕，室内堆积着三尺厚的马粪、垃圾。临解放前（1 月 5 日）一场大火，烧毁房屋三百余间，机器一百余部。”^⑨接管后，经过整修机器，将接管的独立出版社印刷厂、军事调处时期创办《解放三日刊》时所办的工合印刷厂的机器拉来，又从华北新华书店印刷厂拉来部分设备并调入职工 60 余人，成立了北平新华印刷厂，于 4 月 8 日局部开工，4 月 25 日正式开工。

经过书店职工的紧张劳动，东北书店和华北新华书店分别在王府井大街南口和西单北大街建立的两个门市部于 2 月 10 日开

业。分属东北、华北两个书店系统的职工在新华书店的一块招牌下团结合作，门外悬挂的“新华书店”店招，是毛泽东主席于两个月前在西柏坡重新题写的（原店招为毛泽东于1939年在延安题写），在全国最早使用，分外夺目，标志着新华书店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新华书店门市部开业后，受到新解放区的北平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在王府井门市部200平方米的店堂中，每天涌进的读者多达四五千。新华社特派记者刘白羽参观后惊叹说：“新华书店每天有这样多的读者，在全国各解放区都未见到过。”担任北平市新华书店第一任经理的卢鸣谷当时向东北书店总店汇报工作的一封信中说：“……北平有十几个大学，一百四十多个中学。那些大中学校的学生们，看到我们的出版物都特别高兴，都说：过去‘饿’透了，这回可要看饱了。他们把银元和订婚戒指换了人民币，来买我们的各种书刊。……书店门市部里整天挤满着各阶层读者，工人、学生、职员，还有国民党军队起义的军官，他们急切需要知道党的政策和政治常识这类书籍。……几十家私营书店，都来要求批书代售，我们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还有北大、清华、燕京、北师大等一些高等学校的书报代办部，都来和我们联系，希望发给他们一部分新书，帮他们扩大代办部的业务，我们只能少量地给他们一些新书……”^①

为了满足读者要求，新华书店门市部专门开辟了阅览室和借书处，将每种书留出5至10册，免费向读者借阅（只收押金，不收租费），使有限的图书能在更多的读者中发挥作用。借书的人很多，有的把书借回家，不仅全家阅读，还传给亲友读。当时，在图书供不应求、公共图书馆尚未开放的情况下，这个措施很受欢迎，特别是更受一些买不起书的贫穷学生的欢迎。后来，出版新书增多，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相继开放，书店才停止了借

书业务。

北平解放的前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领导和干部迅速到达北平，欧建新作为三联书店总处的代表参加了北平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的工作，他随军进城后即和朝华书店取得了联系。三联书店总处又派营业部副主任赵晓恩到北平筹建新中国书局北平分局，并为三联书店总处从香港迁来北平做准备工作。赵晓恩在北平市军管会的支持和帮助下，很快在王府井东安市场西门马路对面一处被封的绸缎店二层楼房作为店址，立即开始筹备建立新中国书局北平分局。工作人员除了朝华书店原有四人外，从天津分店调来新招收的练习生八人，又从本市招收十多位练习生，合计有二十多人，由刚到北平的香港三联书店门市部负责人蔡学昌负责门市部工作，对新闻同志抓紧进行门市业务的培训。在货源上也作了充分准备，有东北运到的光华版和新华版大批解放区出版的图书，又有朝华书店储备的上海和香港版的图书，齐全的品种是过去不易见到的。

3月11日上午，新中国书局北平分局门市部在红旗招展和爆竹声中开业，热情的读者一拥而入，立时挤满了店堂，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如潮，使整架的图书立即成为空档，开票、收款、往书架上添书成为书店中最忙碌的岗位。第一天的营业额即达40万元（当时200元可兑换银元1元）。

门市部中，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以专台陈列，是销售的热点，《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解放区的一套新文艺读物等书都十分抢手。最受欢迎而难求的是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精装本。一些高级民主人士渴望买到这部书，但书少难以满足。国民党派来和谈因和谈破裂留在北平的代表向叶剑英要书，叶向王府井新华书店经理卢鸣谷要去10本。三联书店过去在国统区和民主党派有密切联系，已到北平的周建人等人请新中国书局北平分

局经理赵晓恩设法，赵和卢鸣谷商量后应允给予照顾，从新华书店的存书中挤出少部分供应。

书店门市部的热闹场面延续了一个多月才稍见平静，而批发、邮购、电话购书、流动服务等业务则逐月发展起来，受到读者欢迎。书店的营业收入，除一部分汇往东北的光华书店供进书之需外，余数用来购进纸张，供日后出版本版书之用。

徐伯昕率香港三联书店部分人员于1949年3月底到达北平，很快建立起编辑出版部门，开始出版三联版新书和重印适合新解放区人民阅读的本版图书。三联书店迁至北平的出版经费，开头时依靠借贷资金运转，住在北平亲戚家的邹韬奋夫人沈粹缜还为此出过力。^⑪

2. 南 京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卢鸣谷、万启盈等一批干部受出版委员会派遣随军南下，他们携带十余万册书籍于4月24日进入南京，会同华东新华书店派来的吕纪、刘近村等人，在南京市军管会文教部领导下成立新闻出版处（卢鸣谷任处长），共同参加出版接管和建店工作，由于他们已有沈阳、天津、北平、济南、徐州等地的接管经验，很快就确定了接管单位，工作进展顺利。

4月30日南京新华书店成立，5月12日书店的第一门市部正式开业。据当时在书店工作的周岩回忆说，南京新华书店门市部的开业“是南京文化出版工作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门市部店堂尽管只有近百平方米，但一天到晚总是挤满了读者。……许多人从早到晚身体靠着墙壁、书架、书台，站在那里，如饥似渴地阅读着革命书刊，甚至中午也不吃饭和休息，晚上停业关门了，有些读者还恋恋不舍地捧着一些书刊继续阅读，久久不肯离去……”^⑫

为了保证南京等城市解放后读者的需要，三联书店留在上海人员组成的秘密机构印制了一批图书，地下党派方学武于3月间将十大箱图书设法由火车运抵南京，于解放后迅速供应读者。南京市新华书店成立了出版科，依据中央宣传部颁发的《宁沪汉翻印书目》和出版委员会发来的纸型和样书，组织当地印刷厂在短时期内印制了上百种、数百万册图书及时供应读者。

3. 上 海

1949年3月初，上海地下党组织派钱杰到商务印书馆恢复徐文蔚、侯相鏊的党组织关系，与石敏良、徐春生组成上海商务印书馆党支部，由中共上海市工委领导。上级党指示商务党支部把大革命时期留下来而失去联系的中共党员、团员和一批倾向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吸收为工人协会会员，组织他们分头对商务的资产、财物、机器、设备、人员等进行调查统计，并做好护厂、护店、护楼工作。当时，在商务担任国民党57区分部主任的黄色工会理事长潘荣林已接到社会局的通知，要他搬运商务印刷厂的机器设备并动员一批印刷技工一起去台湾，到台后保证潘担任印刷厂的厂长。中共商务支部获悉后派石敏良找潘谈话，向他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晓以大义，指明前途，劝他不要执迷不悟，使潘不敢擅动。富于革命斗争传统的商务职工，在中共商务支部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项护厂工作，自觉保护机器设备、财产物资，使国民党的迁厂、破坏阴谋未能得逞。

5月中旬，解放大军已到达上海郊外，中共商务支部接到上级党指示赶制“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横幅和印制上海解放的宣传标语，很快完成任务。商务总馆距离福州路的国民党警察总局只一箭之地。5月25日拂晓，商务职工突见警察总局挂出了表示投降的白旗后，立即在福州路河南路口的跨街上悬挂出具名“上海工人协会商务印书馆分会”的全上海第一幅“欢迎中

国人民解放军”的横幅。9时许，解放军先头部队从福州路外滩方向，由东向西而来，河南路开始解放。在热烈庆祝上海解放的欢呼声中，商务印书馆全体职工坚守岗位，满怀激情地开始了新中国的经济文化建设活动。^⑬

上海解放前，上海地下党组织已在生活书店转入地下的部分人员中建立了一个党小组，由许觉民、方学武、董顺华组成，许觉民担任党小组长，方学武还单线联系了党员范用、孙洁人、吴复之，这个党小组由周天行领导。他们秘密联系了一些在政治上可靠的同志，对上海出版业中有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单位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整理出材料，并分别向那些有官僚资本的出版单位负责人投寄了警告信，要他们保护好资产设备，不得转移破坏。上海解放后，接管时这些机构有的负责人拿出警告信说：信早收到，遵命照办了。^⑭

三联书店为了使上海解放后立即开业做货源准备，从1949年二、三月份即由留沪人员组成秘密的造货机构，由范用、赵均负责。对外借了黄金，购进三千多令纸，接洽几家印刷厂，秘密排印新书和重版书，上海解放前三个月内就印出了新书22种，发排新书三十多种。这批图书为三联书店于上海解放后门市部的开业提供了丰富的货源。^⑮

在上海解放前一个月，中共香港文委派吉少甫、唐泽霖赶到上海，由吉少甫负责出版工作的准备，唐泽霖负责印刷厂接管的准备工作。香港的三联书店、新民主出版社、群益出版社三家合作，由吉少甫携带一套新民主出版社排印的毛泽东著作七种纸型（《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等），另一套纸型则由航空公司寄上海邮局留交“陈中新”（假名）收。5月27日上海市解放，苏州河两侧还有零落的枪声，吉少甫和范用骑着自行车过四川路桥，去邮局取出留交的七

副纸型，许觉民、董顺华早已做好纸张和印刷厂的安排。7种毛泽东著作秘密地先大批量地印好正文，上海解放后再印封面，很快装订好就在书店门市部和读者见面了。^{①6}

上海解放后的出版接管工作由上海市军管会文化教育委员会新闻出版处领导（处长周新武、副处长徐伯昕、祝志澄、李辛夫）。接管出版人员主要有两路人马，一路是出版委员会派出的徐伯昕、祝志澄、朱晓光、赵晓恩、毕青、蔡学昌等人；另一路是来自山东的华东新华书店的王益、叶籁士、汤季宏、宋原放、刘子章、洪荣华等百余人。参加接管的人员曾在江苏丹阳集训，学习党的各项政策和入城守则，整理、研究上海地下党组织送来的关于国民党在上海的官僚出版单位材料，以及一些民营出版业中官僚资金所占份额等情况，为进城后的接管工作作了充分准备。

上海解放后，军管会对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出版机构采取接管、封闭、没收等措施。从5月29日到8月20日，一共接管了33个单位，其中包括没收房屋70处、纸张1万余令、油墨7000多磅、小汽车8辆、大小印刷机83台，以及大量的铅字、铜模、图书杂志，被接管单位的人员602人。^{①7}对渗有较多官僚资本的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则采取先行军事管制，资产清理后，对官僚资本加以没收，私股则发还原股东。还有20家接受外国津贴的出版机构，绝大部分是宗教团体主办的，根据有关条例登记后由宗教团体管理。

6月5日，上海新华书店第一门市部和第二门市部分别在原中国文化服务社和正中书局门市部旧址同时开业。从华北、东北、山东解放区带来的几十万册书刊受到上海读者的热烈欢迎，上海生活·读书·新知联合发行所也恢复营业。除新华、三联外，还运用上海特有的城市条件，成立了人民书报供应社（受